



第7卷

COMMENTS ON URBAN CULTURE

城市文化评论

[主编] 黄忠顺 田根胜
[特约主编] 王 晖
[副主编] 阎 江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第 7 卷

COMMENTS ON URBAN CULTURE

城市文化评论

〔主编〕 黄忠顺 田根胜
〔特约主编〕 王 晖
〔副主编〕 阎 江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城市文化评论》编委会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列)

杨晓西 周致纳 胡经之 饶芃子 黄天骥 曾繁仁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尹 鸿 王德胜 邹晓平 田根胜 许 明 刘治猛
李 幸 严前海 曾 军 朱栋霖 张鸿雁 周 宪
周晓虹 金元浦 欧阳光 高小康 阎 江 陶东风
黄忠顺 康保成 蒋述卓 鲁枢元

主 编 黄忠顺 田根胜

特 约 主 编 王 晖

副 主 编 阎 江

主 办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文化研究中心

地 址 中国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大学路1号

邮政编码 523808

电 话 0769-22861903 0769-22862282

网 址 <http://www.dgcrdc.cn>

邮 箱 dgwh2006@163.com/yanj@dgut.edu.cn/tiangs@dgut.edu.cn

编者的话

这是《城市文化评论》的第七卷。本卷出版之时,适逢国家“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有关城市建设问题的表述中,“发展”和“完善”成为其中的关键词。“发展”之意在于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构建以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完善”之意在于,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一方面要“坚持以人为本、节地节能、生态环保、安全实用、突出特色、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原则,科学编制城市规划,健全城镇建设标准,强化规划约束力”;另一方面,则要预防和治理“城市病”,即“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规范新城新区建设,提高建成区人口密度,调整优化建设用地结构,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这实际上就成为我们今后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对待城市问题的基本认知和基本导向,有关城市文化的学术研究也不应例外。

本卷的“学术前沿”专栏主要发表了四篇文章。埃及学者玛帝哈·埃尔萨夫提在《社会资本与城市发展——以埃及为例》一文中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来阐释社会资本在埃及城市发展中的作用。该研究从社会学角度考察社会资本问题,认为社会资本的指标涵盖信任、互惠、社会保障、共同行动和集合性等社会关系的多个层面。城市发展必须强调运用所有可能的文化因素来满足其发展需求,因为社会资本不仅对城市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也可能成为城市发展的限制。这篇文章无疑有着“另一只眼”的作用,它让我们在对于城市发展进程的考察中有了参照系。曾一果的《我国近三十年来城市文化研究现状综述》对中国近三十年来城市文化研究的基本发展阶段、研究动态、主要研究成果、研究议题和研究的主要趋向等作出宏观描述。其中对于近十年来研究的热点话题——城市文化理论的译介、城市与乡村、城市的全球化与本土化、城市公共空间与大众文化等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如果说,上述两文侧重于宏观的城市文化理论探讨的话,那么,“形象与诗意”栏目所收诸篇论文则是对作家和艺术家笔下形象化城市的研究。张鸿声在《城市资产阶级文化遗存的人格化表现》一文中,以“十七年”与“文革”文学为例,对中国城市资产阶级文化遗存的人格化表现作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考察。刘俊的《跨国经验、城市样态与日常生活》以《刘荒田美国笔记》为个案,通过讨论美国(旧金山)、日常生活、“我”(刘荒田)、中国(台山)等四个关键词,在准确把握刘荒田散文特点的同时,对其中所表露的艺术化的“跨国经验和城市样态”作出深入解读。张立国则通过《一座城市与报告文学》,叙述了有关描述山东济宁市的报告文学作品,由此解析济宁的历史变迁和文化生态。范伟和马国红的《谁的都市》以左翼作家的作品为例,阐释革命文学语境下的都市选择。闻彦的《从〈上海的早晨〉看十七年小说中的家庭形态》针对小说《上海的早晨》中的描绘,展开对建国初期城市中的多种家庭形态分析,体现出社会主义时期的城市家庭伦理新格局。此外,余蔷薇的《影像城市中的“家”与“居”》以“家”与“居”的

关系为观察视角,选取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热播的几部影视作品作为个案,深入思考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底层人与外来者的艰辛生活。与此类似且视野更为宏观开阔的是,田根生、李杨在《当代戏剧与城市文化认同》中对于“戏剧如何在当代城市化转型中发挥其构建文化认同作用”的思考。作者认为,戏剧艺术的群体性与仪式性特点,决定其可以在当代城市文化建设中起到重要的文化凝聚功能,并产生关于城市的“共同体”意识,增进城市的文化认同感。

有关城市文化个性的研究,本卷所载樊星的《汉味杂记》、王彬的《九宫格的四合院》和孙德喜的《重构扬州文化明月之魂》等文章,分别对武汉、北京和扬州等三个城市的文化品格进行解读。樊星从方言、美食、汉商、性格等维度,将武汉及武汉人杂糅南北东西文化的个性活脱出来。王彬则对作为北京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四合院的建筑特点、布局以及历史兴衰,作出了类似田野考古学意义的阐发。孙德喜着重讨论的是明月作为扬州地方文化之魂的历史渊源和基本内涵,以及在当下重构这一文化的重要意义。与着力阐述城市文化个性有所不同的是,本卷中曾令存的《弘一法师与南闽诸城》和李琚平的《长安华严寺创建与杜顺大师坐化》两文则侧重于书写名人与城市的关系。前者意在史料爬梳中探寻弘一法师与南闽厦门、泉州、漳州等诸城既相互适应,又相互“寻找”和“发现”的过程;后者旨在探讨作为唐代名寺的长安华严寺的创建和兴废,与中国华严宗初祖杜顺大师的坐化及华严宗之创立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此外,姚朝文的《论影视民俗艺术产业的研究方法创新》一文论述了岭南洪拳大师黄飞鸿的各色文艺化叙事与开发岭南优势文化产业资源的问题。作者指山,这样的研究不仅具有文艺学和影视艺术学的拓展意义,还具有城市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延展价值。

张永祯的《网络世界,城市文化的新空间》和刘晓丽的《都市空间广告背后的逻辑》,分别从网络和广告等传媒视角透视城市文化。张文在充分肯定网络为城市文化带来思维的革命和新的空间的同时,其失衡、失范、失信和失真等问题也不容忽视。刘文认为都市空间广告是都市文化的重要表征,是消费社会不能缺失的基本构成元素,它们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消费情绪、调动着消费欲望,更是描述都市文化的重要语言。

在“城市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专栏,我们编发了五篇文章。它们人多通过经济和文化的视角,谈论区域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现状与对策。宋阳的《区域一体化与深莞惠文化合作发展研究》对深圳、东莞和惠州三市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实现文化互动、互补、融合的可能性作出深入的论证,颇具启发性。杨曾宪的《青岛城市交通资源优化利用的对策建议》、倪浓水的《海洋城市建设的“整体性原则”:以舟山市为例》着重探讨的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和海洋型城市的建设问题。马会娟、韩玉萍的《城市经济县际差异构成分析:以重庆为例》,以及韩晓亮、廖红、杨刚等的《交易费用视角下的重庆市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变迁研究》两文则以位于西部地区的直辖市重庆为研究对象,对其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作出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城市文化评论. 第7卷 / 黄忠顺, 田根胜主编.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360-6255-9

I. ①城… II. ①黄… ②田… III. ①城市文化—中
国—文集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0637号

责任编辑: 李道学 欧阳蘅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设计: 罗子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5.25
字 数 370,000字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编者的话	1
 学术前沿	
玛帝哈·埃尔萨夫提 文 余蔷薇 译	
社会资本与城市发展	
——以埃及为例	2
曾一果 我国近三十年来城市文化研究现状综述	10
曾 军 李 敏 重大事件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以上海世博会为中心	21
王露微 王志章 基于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化品牌塑造研究	34
 形象与诗意	
张鸿声 城市资产阶级文化遗存的人格化表现	
——对“十七年”与“文革”文学的一个考察	48
刘 俊 跨国经验、城市样态与日常生活	
——论《刘荒田美国笔记》	54
范 伟 马国红 谁的都市	
——革命文学语境下的都市选择	60
张立国 一座城市与报告文学	66
闻 彦 从《上海的早晨》看十七年小说中的家庭形态	76
陈英敏 谈穆时英的洋场文化理性	82
姚朝文 论影视民俗艺术产业的研究方法创新	
——以黄飞鸿影视民俗诗学研究为例	90
 读城记	
樊 星 汉味杂记	
——关于武汉人及武汉味	100
王 彬 九宫格的四合院	108

孙德喜 重构扬州文化明月之魂	116
----------------------	-----

传媒与都市

张永祎 网络世界,城市文化的新空间	124
田根胜 李 杨 当代戏剧与城市文化认同	133
余蔷薇 影像城市中的“家”与“居”	141
刘晓丽 都市空间广告背后的逻辑	148

城与人

曾令存 弘一法师与南闽诸城	154
李珺平 长安华严寺创建与杜顺大师坐化	166

城市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

宋 阳 区域一体化与深莞惠文化合作发展研究	178
杨曾宪 青岛城市交通资源优化利用的对策建议	189
倪浓水 海洋城市建设的“整体性原则”:以舟山市为例	197
马会娟 韩玉萍 城市经济县际差异构成分析:以重庆为例	201
韩晓亮 廖 红 杨 刚 交易费用视角下的重庆市区域 经济发展差异变迁研究	206

论点摘编

城市文化论点摘编	214
《城市文化评论》1-6 卷目录	228

学术前沿

XUESHUQIANYAN

社会资本与城市发展

——以埃及为例

玛帝哈·埃尔萨夫提 文 余蔷薇 译

内容提要 对社会资本的不同界定,取决于不同学者的学科范畴和研究范式。从社会学来看,其主要表现形式是社会网络和社会标准,包括家庭、邻里、朋友和社会结构中的其他群体/组织。测量社会资本的指标涵盖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包括信任、互惠、共同行动、集合性、群众参与、社会团结、社会保障、群集度、自愿行为、社区参与,还有其他合作与协调方面的决定因素。然而,学界对如何测量社会资本并没有达成共识。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著作很好地阐述了社会资本对发展的作用,但有必要指出,不是所有关于社会资本的著作都把其当做社会资本的有利因素。在一些研究者看来,传统文化多半根源于家庭或家族内的信任感与集体观念,它会减少对所属阶层之外的人或团体的信任,因而可能会与城市化进程不相容,从而导致对城市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此,理解社会资本不得不在它相关的范围内考虑到文化因素,这些范围里的每一种文化属性,不仅影响到社会资本的结构,而且影响到它的本质内容。本文在笔者既有的研究基础上,考察埃及城市化进程中社会资本所起的作用。论文同样要参照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因为它们与城市发展紧密相关。

关键词: 社会资本 社区参与 信任 社会网络

引言

“社会资本”是近年来兴起的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应的一个理论概念。物质资本具有物质特性,人力资本重点在于人的知识与技能,与个体的潜力与资格相关,而社会资本是测量社会的另一种尺度。

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尤其是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均有与社会资本相关的著作问世。其中,詹姆斯·科尔曼从学理上对此概念进行了全面界定与分析,使这个术语得以广泛运用。特别是在1990年代,世界银行将其作为发展方案的中心问题,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从此得到了普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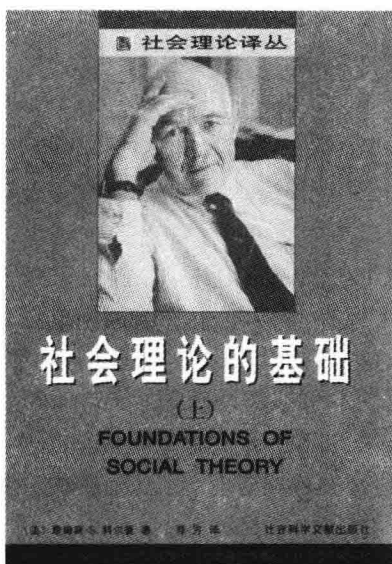


图1 科尔曼关于社会理论的著作

(来源: <http://www.langlang.cc/1145364.htm>)

从不同角度对这个术语进行界定,取决于不同学者的学科范畴和研究范式。但无论从何种角度,其定义的核心都集中在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和相互作用上,一些社会科学家还将此概念扩展到政治方面。从社会学来看,其主要表现形式是社会网络和社会标准,包括家庭、邻里、朋友和社会结构中的其他群体/组织。测量社会资本的指标涵盖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包括信任、互惠、共同行动、集合性、群众参与、社会团结、社会保障、群集度、自愿行为、社区参与,还有其他合作与协调方面的决定因素。这些指标均从属于社会结构。这恰恰说明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是由个体或团体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网络。

因此,理解社会资本不得不在它相关的范围内考虑到文化因素,这些范围里每一种文化属性,不仅影响到社会资本的结构,而且影响到它的本质内容。由文化差异而引起的社会网络中的差异,不仅与社会距离的大小相关,也被社会网络间的界限所影响。学界对如何测量社会资本并没有达成共识,社会科学家们纷纷从各种不同角度来解决这个问

题,因此想要在此方面提出一个统一的测量标准是非常困难的。

本论文试图以上述指标作为参照来研究埃及城市发展中社会资本所起的作用,参照标准基本上来自社会学观点,论文之所以要关照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是因为它们与埃及的城市发展紧密相联。

社会资本与城市发展

关于社会资本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立场。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资本有利于城市发展。布伦(Paul Bullen)和奥妮克斯(Jenny Onyx)认为社会资本是富有成效的,个体或群体之间形成的网络使每个人在各自所处的位置上成为互动交流的主体,因而社会资本的存在都能够为个体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社会资本不够雄厚,那么城市发展机制就会相对薄弱,社会发展也就相对迟缓。这个观点证明社会资本对改善城市贫困状况起到重要作用。底层民众的社会资本可以为他们带来重要的社会保障,因为社会资本建立在个体间的合作基础上,对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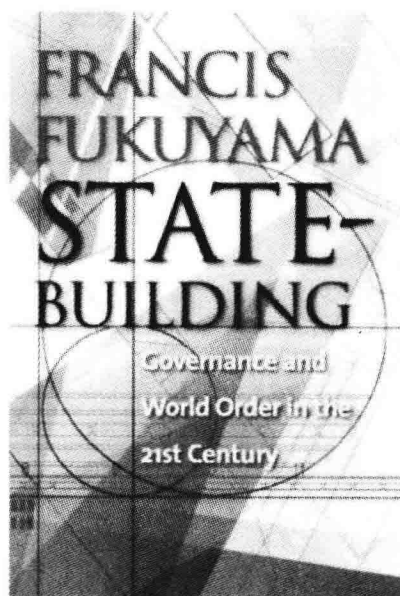


图2 福山社会学著作

乏社会保障的城市贫民而言,这种合作就变得更加意义重大了。世界银行报告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证明扶贫计划、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城市经济发展都需要社会资本。

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资本并不利于城市发展。一些研究者认为,传统文化多半根源于家庭或家族内的信任感与集体观念,它会减少对所属阶层之外的人或团体的信任,因而可能会与城市化进程不相容,从而会对城市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集体内的团结会减弱集体成员与外界合作的能力,如果一个人不属于这个亲属圈就会被看做是陌生人。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认为这种情况会导致腐败。他还肯定宗教在社会资本中所起的作用,认为宗教也是社会资本的一种资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宗教形式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都是积极的,因为宗派主义也有消极影响,它会酿成褊狭、仇恨,甚至会达到暴力点。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在社会中就起到负面影响,同样也会成为发展的主要障碍。如果社会因为宗派主义而四分五裂,那么这个社会就得维持安全和秩序,而无暇顾及其他发展。

福山进一步将全球化作为第二种社会资本的资源。全球化向来被认为是对本土传统文化的一种威胁,因其引进新的观念、行为和规范,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新的价值观,这自然会对传统社会形成挑战。要在全球化对现代性的积极影响与崩溃的传统结构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全球化给社会带来技术创新、各类信息以及各种各样的现代观念,传统结构终会因其受到破坏,保持好这两极间的平衡,不仅是一种挑战,更是寻求发展的重要手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鼓励知识获取的社会资本可行性问题被提了出来,因为获取新知识与传统规范相矛盾,这里的参考依据也包括信息与通信技术。

埃及城市发展的案例

为了研究埃及的社会资本,2003年笔者带领一个研究组进行了实证研究。此研究以贫困人口为主要对象,研究方法是以按城乡划分的4000个家庭为样本,农村家庭占2280个,城市家庭占1720个。选择标准以贫困为基础,这里的贫困不是指家庭收入少,而是指丧失了基本生活需求。第一部分研究“主观贫困”,第二部分研究社会资本。根据调查计划表,对家庭成员进行调查,调查内容集中在上述社会资本的指标上。

调查结果表明,在埃及文化的共性特征上,农村和城市两个阶层间虽然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一些差异,即使没有显示出巨大分歧,也多少出现一种亚文化鸿沟。最后,根据实际研究的结果,笔者为埃及文化的社会资本勾勒出以下轮廓:

城市/农村的“信任半径”

调查结果显示,埃及农村与城市相比,其拥有的社会资本要相对雄厚一些,因为从关系亲密的家庭/家族来看,农村文化的亲属网络异常强大,亲属网络既包含信任、合作、安全感、社会团结等重要因素,又是社区层次上相互作用的主要责任者。另一方面,城市文化分得更细,其家庭关系的纽带对个人的作用没有像在农村那样紧密,但结果也显示,紧密的邻里关系却是其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能代替家庭关系,也能充当很好的补充。莱达·贾德森·哈尼凡(L. J. Hanifan)对此有如下描述:

如果只留下一个人,那他是无法进行社交的。如果这个人得以联系他的邻居,他们和其他的邻居就会累积成一种社会资本,这样可以立即满足他的社会需求,激发足以使自己在整个社会改善生活条件的潜力,总体上看社会将受益于其所有成员的合作,而个

人会发现在自己所属的圈子里会有很大优势, he可以和邻居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和睦相处。

这里可以参照福山“信任半径”这个概念,把社会资本看做“基于合作规范共同体”。在这种意义上,城市的信任半径会比这个社群本身更小,因为城市里的社群较大,其信任半径的边界会局限于某些个体,而非全部成员。这些成员都有属于各自的个人信任半径,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城市暂住,社会网络很有限,城市社会环境的这种复杂性决定了其社会联系必然不够紧密。

埃尔·赛义德(Al Sayyed)针对外部社群进一步研究信任指标,这里的外部社群主要是指政府。他认为政府存在信任危机,尤其是个人与政府之间,因为政府法律严格限制个体形成社群。

社区参与

调查结果显示,城市的社区参与程度较低,农村稍微高一点。这种情形证明,传统社会里社群与社群之间的信任不利于在个体与其他社群间形成信任感。在许多情况下,城市环境里的人与人之间,尤其是贫民之间情感淡漠。造成这种冷漠感的一个原因是,贫民不得不与恶劣的环境持续作战,他们必须设法解决温饱问题。这样的思想负担使他们没有时间参与到社群中去。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对自己所属群体以外的社群缺乏信任的态度,尤其是对政府。另外,缺乏信任减少了社群的信用,尤其是政府。这与上述埃尔·赛义德的观点一致。埃及的城市居民希望政府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设施,但不愿政府介入到他们的团体中来。如果政府无法满足他们的期望,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以至最后失去信用。加深埃及市民尤其是城市贫民与政府之间裂隙的是他们内心的被排斥感,他们被挤出公共生活领域,被排斥在社会利益范围之外,因而失去政府救济,疏远社区组织的活

动,而社区活动是倾向于认同政府的。

社区参与的更高层次也是以亲属血缘关系为主干,它以家庭或家族关系为基础,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上,因而在农村环境里社区参与程度会更高。

政治参与

调查结果表明埃及城市的政治参与比例较低。这里的政治参与是指居民参与选举和地方议会。农村有更多人参与政治,其主要原因是农村的政治部门大多建立在家庭或家族关系上,农村文化的社会结构包括以公共关系为活动中心的集体,围绕政治活动的集体参与,在选举期间最为突出。城市文化中的政治因素不包括亲缘关系,政治参与被归为社区参与一类。尤其是对城市贫民而言,他们的利益领域并未集中,原因如前文所述。

社会资本与市民团体

有关社会资本的文献表明,市民团体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自愿性组织能够将人们彼此联系起来,通过这种非正式规范彼此建立信任和互惠,通过提供服务将边缘人群重新融入社区。由于埃及的城市贫困率高,政府提供的服务相对较少,因而非政府机构的作用变得至关重要,实证研究从此角度调查社会资本中非政府机构的职责和功能,认为其在埃及文化的社会网络中起着重要作用。个人与非政府机构间最大的影响来自宗教,包括穆斯林和基督教。调查结果显



图3 埃及人民参与议会选举

(来源:<http://news.sohu.com>)

示宗教组织具有高度的信任,其成员行为有极强的信用,他们会带着一种归属感寻找由这些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服务。这里的宗教尺度非常关键,它们能取代缺乏信任、信用和亲缘关系的官方体制,从而减少成员的被边缘化之感。

满足感/宿命观

调查对象普遍对他们生活感到满意,不论他们面对多少问题。大多情况下这种满足感显示在有限的社区层面,个人表达他们对社区的均衡意识,其主导特征表现为个体具有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宿命感,于是对他们生活表示满足。



图4 埃及基督教遗址——阿布米纳
(来源:<http://51dh.net/travel/ArtImage>)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满足感是个体自我形象的反映,它与贫困概念有关。如果运用客观贫困的衡量标准,所研究的对象被列为贫困阶层,其生活条件极差,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可是有趣的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并不把自己当做“穷人”,这就是“客观贫困”与“主观贫困”的矛盾——他们到底是什么?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后者的身份很好地表现

出他们对自身生活的满足感——这是一种典型的宿命观。

这种态度可以从两种相反的观点看出来。一方面,正如许多调查对象所报告的,它 是被建构出来的一种接受感,即无论上帝赐予他们什么,或者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他们都带着一种均衡的满足感生活。这种情况下,这种态度会减少他们的挫折感。另一方面,这种态度不利于发展,因为无论生活有多糟,他们并没有努力改善现状的意识,没有任何激励进步的因素,没有寻求更好生活条件的期望,因此也就缺乏改善生活的动力。这里出现的问题是,既然这种态度有可能成为发展的障碍,那么它在发展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沿着这个问题我们得出,“贫困文化”会延续下去,因为贫民接受他们既定的命运,没有努力改变现状的意识。

有必要指出,研究显示城市范围内的“主观贫困”更强一些。城市贫民对自我形象的观念非常清晰,自己就是一个贫民,而处于同样社会经济水平的农村居民不一定会这样认为,贫民如何界定他们的状况会随城市和农村的不同而变化。伴随着在城市环境中的生存挑战,城市生活的复杂性会提高人们的期望,因此当他们不能实现期望时,就会产生挫败感。农村文化中,期望值是很低的,作为贫民的自我形象因而受到影响。

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多半建立在亲属关系上,在农村更为普遍,而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会延伸至邻里及朋友。一般来说,每个人都倾向于与具有相似社会经济/文化特征的人接触,而尽量避免与那些被他们归为“异类”的人或陌生人交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在这里是决定性因素,它在农村几乎不存在,而在城市却广泛存在,因此社会成员间的相互影响处于较低水平。

安全/保障

安全感是社会资本的一个基本组成部

分,它的出现首先与城市和农村的家庭成员相关,城市里的邻居是第二种安全/保障来源。这种安全感的一个很好的来源是危机时期的合作,在此情况下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团结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财政危机不仅可以通过家庭成员的帮助度过,而且还可以运用邻里关系,这种相互支持可以扩伸至所有可能存在的危机情况。

研究社会资本必然会引出与它在发展中的作用相关的问题,这里更强调把社会资本当做不利因素而不是有价值的东西。传统的社会网络大部分建立在亲缘关系上,由此产生强大的集团间的信任,从而对政府和所有与公共生活相联系的组织失去信任——这些都可以看做是发展的阻碍因素。

埃尔·赛义德对埃及形势的描述可以作为可行的参考。在全球化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他与福山持相同的观点,将他的观点运用于研究埃及城市发展问题可以得出,全球化导致传统的社会资本存量萎缩,这种情况表明一种“促进发展的障碍”。当社会资本存量因此而被节制时,它会阻碍国家向真正的民主化转变,埃尔·赛义德由此推断:“全球化对社会资本产生的有利影响在埃及城市发展案例中被减弱”。

事实上社会资本如果利用得当,可以成为发展的有利因素。从这个角度看,这项研究提出了可能对工作有帮助的若干建议和想法,有助于激发社会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有一些因素超出了研究范围,在此方面也能够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应该如何做

首要的是教育机构

群体间的团结是社会的积极因素,因为它表示在各自的群体内维持一种稳定的秩

序。然而,当这种团结成为与外界群体交互的阻碍时,其消极方面也出现了。这种态度可能会阻碍社区参与,因为大部分会导致对外界群体几乎或完全缺乏信任。研究者认为能够帮助发动社区参与的方法是从早期开始培训,这里的教育体制属于低层次的社区参与。比如埃及市区学校状况是,学校排满了课程没有留下任何空间进行课外活动,校委会不再属于学校生活的一部分,青年不接受选举、竞选或者参与学校活动。那么如何做到从早期开始培训社区参与?在规模较小的学校/大学里,让学生参与社会福利和政治生活,这应被列为教育体制的组成部分。参与他/她早期阶段的生活是为社区参与播种的第一步,它是培养一个人对社会认同/归属感的基础。参加学校选举,在校委会工作,参与学校生活相关的决策,这些都是在学习经验以便今后运用。这些经验一定会增强学生和青年的参与精神,因为通过这些互动交流,他们可以对集体形成认同,并且不断内化为自己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从而形成共识性规范。青年能够学习用这种方式看待社会的正负两面,从而产生需求,通过支持良好方面,解决坏的方面来进行改善与发展。这是激活他们在发展中的作用的首要经验,是参与社区事务的基础环节。不重视知识的重要作用,就无法完全地寻求发展。教育体制必须强调知识获取,这建立在对它的内涵进行广义理解的基础上。这里的目标是要解释它对发展的影响,同时校正一些新兴出现的反对它的错误理解。

另外,作为这个方面的重要机制,信息和通信技术也起着重要作用,需要通过扩大使用来鼓励它。一旦个人扩大他/她所在社群的界限,此经验也对进行政治参与有帮助。

其次是政府的作用

政府在激活社会资本以帮助城市发展上发挥着作用。如何利用社会资本是一个巨大

的挑战,要想成功解决发展问题,就需要动员市民,因而不能忽视文化中听天由命的态度。如何克服在大部分人主要是贫民中被边缘化之感,需要适当的沟通渠道,让他们彼此建立信任,互帮互助,增强他们之间的信用。

在此背景下,政府需要出谋划策让公民参与社会活动,重点不仅在于实施,更重要的是设计方案和计划,还要考虑到决策的不同方面,所参与的活动取决于社区需求和社区优势。在令人关注的问题上,排除目标人群是远离疏远的良方,这就是目前会产生排斥感的原因,尤其是在贫民之间。

适当利用社会资本的可利方面是一种很好的沟通方式,也就是说,既要在群体内又要在强大的亲属关系内进行的网络互动中产生信任感——这是策略的基本动力。社会资本,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资源,如果合理利用,能够有利于充分增强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这个方法能够有效地将社区成员纳入为其利益服务的项目中,他们之间就会产生对社区的认同感,更重要的是,这种参与有助于为政府搭建一座信任之桥。如前所述,缺乏这种信任是社会资本在发展中的消极方面。

再次是政治参与

边缘化会延伸至参与地方社区的政治生活中,这种疏离感不仅包括无法获得不同类型的基本服务,也包括不能进行地方决策,因而政治参与水平较低。改善这种情况的方法是政局和政党扩大他们的活动范围,以此将社会被边缘化的群体涵盖进来。部分社区成员,尤其是底层贫民,他们之所以缺乏政治参与,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对所在群体态度冷漠,而可能是他们对此缺乏认识,甚或无视正在进行的社区政治活动项目。

诚然,疏离导致冷漠,但只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会帮助克服,或者至少是减少这种冷漠,尤其当目标人群看到利益/需求得到解决时。大学阶段参与的政治活动受到由内外各

种因素带来的诸多障碍,大学管理产生的限制,除了被国家安全部门多次干预,还影响到学生参与政治活动。这种形势剥夺了他们以后参与更高一层国家级活动的训练机会。人们希望放宽大学政治活动的限制,这不仅有利于学生表达民主的自由,而且是训练政治参与的有效步骤,为他们积极履行公民职责作准备。

这里可作参考的是,训练政治参与的重要性,以及今后参与其中的重要性,因为它是民主的重要资产。当然,此问题超出了本文的阐述范围,但它足以证明其重大意义。

结语

本文试图在笔者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阐释社会资本在埃及城市发展中的作用。该研究从社会学角度考察社会资本问题,内容涉及测量社会资本的各项指标,社会资本的功能,以及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城市发展必须强调运用所有可能的文化因素来满足其发展需求,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社会资本不仅对城市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也可能成为城市发展的限制,如上述埃尔·赛义德和福山所述。

把利用既有的社会文化作为城市发展的第一步,这是极为可行的。稳固的社会网络可以为之形成坚实的基础,社群内的团结意识对城市发展来说非常重要。就埃及的城市发展而言,需要集中力量,采纳能够激发出社会资本积极作用的有效方法,以充当一种投资来努力促进城市发展方案的实施。如果社会资本不属于某个人,而是作为某个群体的资源,就能很好地动员社区成员以寻求发展。

实证研究集体中在贫民阶层,这个被边缘化的群体形成了相当高的人口比例,亟需利用社会资本为其利益服务。据世界银行和上文所述,社会资本在扶贫计划中发挥着重大作用,这为城市化提供了很好的依据,因为

贫困无疑阻碍了城市发展,这里所指的是广义的贫困,它超出了物质范畴。生活在被剥夺了基本需求状况下的个人是发展的一块大绊脚石,可以用哈尼凡的一句话来说,社会资

本是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

(作者:玛帝哈·埃尔萨夫提,开罗美国大学社会学教授;译者:余蔷薇,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